

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起来，是管党治党的一种内在要求，这里的统一，是深度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离，做到这一点，需要在理论上对二者统一的内在机理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在实践中真正形成二者统一的体制和机制。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联系

□ 戴焰军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全面从严治党根本途径，就是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地统一起来，夯实思想基础，完善制度保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现状深入分析和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系统总结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思想。

重视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是与我们党成长发展的客观环境直接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但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度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而且，党在整个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中活动的重心始终在农村。客观环境决定了加入党组织的成员大部分并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保持自身的性质并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通过艰苦细致的党内教育，把进入党内的其他阶级成分的人改造成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以，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很早就被确立为党的建设根本要求，并在长期实践中成为党的一个传统优势。

在新形势下，由于党的历史方位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的课题与革命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思想建党对于我们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党所面临的各项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需要通过思想建设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于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党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前所未有，需要通过思想建设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有充分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准备，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真正经受住各种考验；党所处的现实社会条件给党的组织构成提出新的课题，加入党组织的成员社

会背景与思想动机复杂多样，需要通过思想建设不断强化广大党员的党性意识和组织观念，保证我们这个党在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始终不变。这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环境下党的建设取得的成效，已经证明了思想建设的重要作用。当然，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也具有新的时代要求。除了思想理论教育，还重点突出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纪律作风、权力观、政绩观教育，就是新形势要求的突出体现。

我们党重视思想建党，但思想建党绝不是简单的思想宣传和空洞的理论说教。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要把思想建党的要求和目标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各项法规和制度。因为，党的各项思想主张和思想要求，都必须通过严格科学的制度来体现和落实。党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组织，就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来保证自己内部的团结统一和步调一致；党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成功实现自己的各项目标，就必须使自己的各项活动有严格的规矩和科学的程序；党要使自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执政活动中掌好权、用好权，不因权力滥用而失去民心，就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都要靠制度治党来实现。所以，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根本性要求。

同思想建党一样，制度治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优势。我们党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而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到了一个地方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铁的纪律；我们建立的苏区、根据地、解放区之所以被很多党外民主人士看成一方净土，视为中国的希

望，之所以成为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向往和奔赴的圣地，之所以为广大人民群众称为一片明亮的天，就是因为那里实行着不同于国统区、敌占区的制度和法律，那里像毛泽东所讲的，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无须讳言，我们在制度治党方面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以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但我们正是用制度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而且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现在我们强调制度治党，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就是对我们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弘扬。

实际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思想建党从来没有、也根本离不开制度治党。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系统阐述思想建党的理论，提出思想建党的要求，而《古田会议决议》首先是一个制度，是在为思想建党建规章、立规矩。我们说古田会议重要，首先是因为这些思想建党建章和规矩的确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我们党思想建党的各项制度也逐渐健全，这是思想建党成功的有效保证。人的思想形成和转变，都直接取决于他所生存的环境，包括生产生活环境、学习教育环境，也包括规章制度环境。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制度环境不仅对人的习惯养成和意识培养有直接效应（如纪律观念的增强、团结精神的强化、忠诚品格的培养、组织意识的提升等），而且，制度环境的规范引导功能还会对人在其他环境中所受的影响直接发生作用。比如我们党的思想教育，并不只是书本学习和课堂教育的要求，还包括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接受锻炼、经受考验，党员干部勇于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是党内思想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当然，制度治党也离不开思想建党。制度本身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脱离当时人们的整体思想状况的实际。所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思想水平，是提高制度水平和增强制度执行力的重要前提。我们提出要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规则意识，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和纪律意识，强调要把纪律执行的责任落到实处，意义就在于此。当前，提高我们制度治党的水平，首先要提高全党对于制度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的充分认识，真正确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确立制度在广大党员干部心目中的权威性，克服权大于法、言大于法、人大于法，把个人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次要进一步提高党内立法水平，提高对于党内法规制度内容科学性的理解水平。使党内法规制度更加切合实际，更能体现刚性原则，具有更为完备的程序保证，更为系统的内在体系，并创造更好的外在制度环境，防止制度变成“橡皮筋”和“稻草人”。再次要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完善，随着制度的文本形式不断完善，迫切需要的是怎样保证制度更好得到执行。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教育党员干部强化制度意识，增强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完善相关的制度运行体制和制度执行机制。体制机制，其实也是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再通过党员干部不断提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工作自觉性来保证制度得以更好地执行。

理论解读

政治坚定 作风过硬

——刘亚楼对干部的严格要求

□ 叶介甫

刘亚楼曾经是红军长征中的年轻师长，也是东北野战军精明能干的参谋长，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第一任司令员。他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空军中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头禅：“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训话。”

“在政治上不要犯迷糊”

1958年1月空军在南宁召开会议，提出了空军工作“大跃进”的口号。一时间，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准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

空军翻译处很快就掀起一股浮夸和弄虚作假的歪风，提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什么“译文速度5年内翻一番”，“一天要译4万字”等等。还把这些所谓“优质高产”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在全军中“提高认识”，一时间弄得乌烟瘴气。许多领导干部明明知道这是胡闹，但面对咄咄逼人的形势，谁也不敢讲话。刘亚楼看到这些材料后非常生气。

“好一个‘优质高产’，这材料是谁弄的？”

“我。”翻译处处长何原说。
“何原！你究竟想把翻译处引向何处去？！我看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别说一天翻译4万字，就是叫你反复写‘人民日报’4个字，你也写不了4万字啊！简直是胡来，完全是弄虚作假，在政治上不要犯迷糊，这是破坏翻译队伍！”

刘亚楼这一骂，刹住了翻译处的浮夸风。

“必须严肃处理这种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

1963年6月17日，空军某基地伊尔—12型飞机拆螺旋桨时，因后圆锥贴合较紧，机械员拆不下，便去请示副中队长。这位副中队长不分析原因，抡起12磅大锤硬打，机械员担心损坏，两度劝阻，他反而说：“有我在怕什么，出了问题我挡着。”以致发动机轴头螺纹损坏拆不下来。到此时，这位副中队长仍不报告，继续捶打，铁锤声唤来了在附近工作的大队长，大队长不但不制止，反而以两米长杠杆加大力臂，继续蛮干，结果将轴头前部五扣螺纹全部拉平，造成一台发动机提前更换的严重地面事故。

就在两个多月前，该基地的伊尔—12型飞机在西宁执行任务时，曾因同一原因造成过一台发动机提前更换的事故。一个星期前，该基地安—2型飞机准备起飞

时，机械员将前机匣整流包皮拆下放在发动机包皮内，中队长、机师未作检查即行发动，当推转速到1800转/分时，放在发动机包皮内的整流包皮被吸出，打坏了两片螺旋桨叶。

看到这个基地的报告，刘亚楼愤怒了。他在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上说：“3个月内，这个基地接连发生三起连续损坏两台发动机和一具螺旋桨的严重地面事故，绝不是偶然，不是什么技术水平低，也不是上级没有明确规定技术操作方法，而主要是某些机务领导干部工作上马虎，不严格要求，不按章办事，不用脑子，不接受教训，真是个‘败家子’，必须严肃处理这种马马虎虎的工作作风，通报全军！”

1963年11月，刘亚楼在空军训练作战会议上提出：“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要落实到干劲、用脑、标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成为空军各项建设的重要遵循。次年，中央军委决定大力整顿机关作风，提出要宣传空军领导机关建设的经验。

“在生活上很在乎的作风要不得！”

1959年9月，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有关部门按规定想给他换一辆“大红旗”轿车。刘亚楼谢绝了这一安排，并批示办公室主任不准换车。

不久，刘亚楼到杭州开会，工作人员趁机把他那辆“吉姆”轿车送厂大修。刘亚楼回来时车子还没修好，办公室主任便领回了那辆“大红旗”，前去机场迎接。

刘亚楼走出机舱，看到了停在不远处的“大红旗”，脸上笑容立即收敛起来。办公室主任解释道：“那辆‘吉姆’正在大修，所以……”刘亚楼批评说：“我的车送厂大修了，你们可以从空军车队派辆别的车嘛，我认为没有车不是理由！”办公室主任无言以对。刘亚楼接着说：“我已反复向你们讲过，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换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是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这种在生活上很在乎的作风要不得！”最后，刘亚楼严肃地说：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你是个老同志，怎能如此轻率地处理问题呢？

办公室主任低下了头，轻声说：“司令员，我错了，您批评得正确，回去以后，我要作检讨，不过，现在车子已经开来了，您就坐这一次吧。”

刘亚楼坚定地说：“不行，一次也不能坐，今天我可以搭别人的车回去！”于是，他便坐着副司令员的车回到了空军大院。

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作用

□ 张荣桓

整风运动的策源地

1941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首先在党内领导层进行整风。随着党内领导层整风的深入，为了更好地教育全党尤其是党内干部，需要将整风运动推进到全党。中央党校聚集了七大的代表，正是一个很好的阵地和突破口。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并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一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秀，分好坏。”2月8日，他又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中宣部召集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

毛泽东此举可以说是把中央党校作为了全党整风的策源地，用中央党校这个阵地带动全党的整风。在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治

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指出：“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今后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毛泽东此后亲自指导中央党校的整风工作。

整风运动的窗口和标杆

毛泽东负责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后，中央党校的整风工作在彭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彭真关于党校改组的目的讲话，他说：“中央党校再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泽东整顿三风的精神。”彭真用“完全吻合”四个字说明了中央党校为何改组，也指明了此后中央党校整风的方向和目的，指出中央党校当前的教育就是要为延安整风服务，要教育干部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中央党校的整风认真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最广泛地发扬了民主，号召大家打破顾虑，畅所欲言。彭真还就时政问题和学员在整风中存在的一些困惑，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

同志来中央党校作报告。彭真还主持制定了《党校政治教育计划》，对党校的政治教育和整风学习作出整体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导党校整风的纲领性文件。1942年5月1日又主持制定了党校学习22个整风文件的计划，规定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一切能记笔记的必须写笔记。其后根据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要求，中央党校的学员笔记由毛泽东和彭真负责。当时的代表回忆，“毛泽东亲自看了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并改正了某些错误，这对大家教育很大”，对广大学员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当时中央党校聚集了大量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党校整风进行指导和检查，党校在彭真的领导下整风进展顺利，毫无疑问，中央党校成了全党整风的窗口和标杆。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1943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希望在党校的学员通过参加整风学习后，能在以后的工作中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整风运动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非常关心党校工作。据统计，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至党的七大召开前，亲自去

党校作报告和讲演，以及在电报中提及中央党校的关于干部教育和整风内容的次数多达十几次。他还亲自主持了扩大中央党校规模的工作。在原规模的基础上，将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作为党校第三部，学员多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同时，还成立中央党校第四部，学员多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大体上是地委、旅级以下的干部。1944年2月又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组建成中央党校第五部和第六部。

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从各地选派干部到延安尤其是到中央党校学习的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频繁致电各地，要求地方分局必须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甚至对一些地方选派干部不力给予批评。他在致晋察冀分局电报中指出：“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地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几天后，又在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的电报中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根据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的，要求各地选送高中级干部、有造就前途的干部到延安学习的条件来看，这正是中央党校的招生对象，所以各地所选干部大部分都是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党校的整风运动。

扩大中央党校的办学规模，要求各地选派干部到延安和中央党校学习，这

就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实际上这些学员也是整风运动的主体力量。在党的七大召开之际，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就是为了把更多的干部纳入党校的整风中，统一思想。毛泽东后来指出：“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是纯洁的。”还指出：“像我们现在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抗战的关键阶段，培养更多的干部打开新的局面，所以把更多的干部聚集纳入到整风当中统一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经过革命实践在党内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在全党整风的关键时刻又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所以中央党校整风取得的巨大成效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密不可分。而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又很好地推动了全党的整风，通过整风运动培养了大批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纯洁的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海拾贝

这里开，这个高度评价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毛泽东在这里，七大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延安时期是中央党校历史上一段辉煌的岁月，这一辉煌与